

新型城镇化突破“钱从何来”瓶颈

新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我国未来几年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目标、重大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与过去从发展角度强调城镇化有所不同,这份规划突出了新型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创新,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所需要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以改革的突破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突破,成为一个鲜明的特点。

以融资为例。在新型城镇化中,无论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核心的问题总绕不开。这就是“钱从何来”,即新型城镇化的融资机制如何创新。过去的城镇化,客观上比较依赖土地财政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于传统城镇化“要地不要人”,其城镇化的成本确实偏低,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

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的成本被人为压低;而且可供出让的土地还比较多,不透明的地方债务增长空间还比较大,勉强可以支撑城镇化进程。然而,两方面的变化,使得这种非正式的城镇化融资制度安排难以以为继。

一是这种制度带来矛盾与风险越来越突出,土地财政引发的地方债务风险、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等,都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二是新阶段城镇化的速度要超过过去。6年内努力实现城镇化规划提出的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意味着每年将近1700万人要实质性融入城镇,即实现人口城镇化;相比之下,过去35年城镇化进

程中,城市户籍人口年均增长不超过1000万。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提速势必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巨大。国家开发银行预计,未来3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将达25万亿元。面对如此之大的资金需求,如果不创新融资机制恐怕难以承受。

在这个背景下,规划也注重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设计。明确提出了加快财税体制和投融资机制改革,创新金融服务,放开市场准入,逐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除了在税制上提出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外,在投融资体制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和评级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考虑到当前地方债务压力,这份规划能明确开地

方债务,确为不易。

从长远看,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必将带来一系列的联动改革。例如,需要修改《预算法》,改变地方政府不能成为举债主体的规定;再例如,要市场化地发行市政债券,需要改革当前政府预算会计制度,系统地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

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型城镇化不仅是个发展的问题,更是一个转型与改革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规划专门讲改革的篇幅并不长,但全篇的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除了投融资改革外,规划部署的改革任务并不少。着眼于2020年的目标,需要尽快分解并落实新型城镇化的改革任务,实现新型城镇化改革的重大突破。京文

治霾治污提速 亟须大数据思维

我国居民暴露在环境污染中的情况是怎样的?环保部日前发布了首个全国性的环境大数据研究成果,结果显示,我国有2.5亿居民的住宅区靠近重点排污企业和交通干道,2.8亿居民使用不安全饮用水。(3月16日《东方早报》)

相较于模糊的语言表述,直观的数据显然更具传播优势。但人们对于水污染乃至整个环境状况的知情权与知情欲,显然不止于此。比如,这2.8亿人口如何分布?不安全饮用水到底有多严重?是哪些因素造成?有怎样的具体危害?这些都比一个大数字更“接地气”。而要给出这一类“数字背后的数字”,就必然要牵涉下一个传播度颇高的概念——“大数据”。

何谓“大数据”?不同的应用领域对应不同的解释。在环境监测上,我们至少可以这样理解,它包括污染的严重程度、类型、交叉程度、分布区域、危害、所波及的人数等各种具体数据,以及基于数据之上的综合分析,它能为环境治理和环境信息公开找到一条更为便捷与高效的途径。

建立“大数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当前已处于传统环境风险与新型环境风险并存的时代,如果依然延续传统的治理模式,已很难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治理需求。雾霾等现代型环境风险的出现,也自然为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不采用“大数据”分析,建立立体的治理框架和信息公开机制,环境危机的应对就难免力不从心和低效。

我们对于无处不在的污染和危害究竟知多少?前段时间纷争一时的雾霾危害,至今也难见权威结论,就可

见其中的信息匮乏程度之严重。可以说,无有效的“大数据”支撑,就不能使环境危害的程度被彻底的认识,也就更难见其为有力的环境治理。

于此而言,加快环境监管、监测的“大数据”步伐,以立体的方式来测量与评估环境的影响,是现代化治理的题中之意与前提条件。它的必要性还在于,任何成功的环境治理经验都表明,化解环境危机,不可能仅仅依靠某个职能部门,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体的参与同样必不可少。只有充分的数据公开才能确保让每个人都置于可被认识的环境风险之下,也才能赢取环境治理上的最大动力和参与度。

事实上,环境监测方面的“大数据”尝试已经在开启。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著名环保人士马军领衔的环保NGO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他们已于2006年开始先后制定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数据库。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像“向污染宣战”一样“向污染宣战”。而“向污染宣战”,首先需要的就是“知己知彼”的环境信息获取与公开,“大数据”正是其实现的重要手段之一。加快环境监管的“大数据”步伐,当被早日提上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 朱昌俊

“婴儿安全岛”需重新出发

广州市社会福利部门近日暂停了当地正在试点中的“婴儿安全岛”,主要原因是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需要暂停试点进行总结,并做好已接收婴儿的防疫、分流等工作。(3月17日《新京报》)

据了解,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设立的“婴儿安全岛”于今年1月28日投入使用,截至3月16日,共接收弃婴262名,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接收弃婴数量远超过开展试点工作的其他城市同时期的接收数量。

有关方面表示,广州市社会福利院的居室、床位、人手和隔离设施等均无法满足弃婴数量快速增长的要求,暂停试点后,将重点做好弃婴的护理、治理和分流、收养工作,现在临时“闭岛”,既是为了将已入院的孩子照顾好,也是为了日后更好地做好安全岛相关工作。

作出暂停试点的决定,显然是广州市社会福利部门最初预估不足。不过既然是试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就允许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取得经验以及论证某项工作的可行性,暂停不是停止,只是需要有一个缓冲期,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毕竟,“婴儿安全岛”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对新的问题如何把握,需要不断地探索和论证。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婴儿安全岛”的设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对于婴儿来说,这是一个福音,他们至少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遗弃后再遭受到不堪的命运。但是,对于成人来说,这个问题还陷入在伦理困境当中,人们在法与理的争论中仍存有分歧。有人认为,“婴儿安全岛”的设立是在变相助长弃

婴行为,也有人认为,这是政府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无论怎样,国家和社会对于婴儿的保护只有加强,不会退却。自2011年6月至今,我国已在10个省、市、自治区展开了25个“婴儿安全岛”试点。而从接收弃婴的人数上来看,各试点之间差异很大。例如,最早开展试点的石家庄市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接收弃婴约180人。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于2013年4月开展试点,至2014年2月仅接收4名弃婴。广州在一个半月试点时间接收了超过200名弃婴,远超过其他城市同期数量。专家认为,交通条件便利、人口流动频繁、医疗资源集中是出现弃婴的主要原因。多数父母遗弃自己的孩子,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决定遗弃,就会送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所以说,广州承担的可能是来自全国的压力,这也是有关部门最初预估不足之处。

从所接收弃婴均患疾病来看,解决弃婴问题、为“婴儿安全岛”减负的根本途径还是要从源头上去避免新生儿缺陷等现象,加强产检工作,健全儿童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医疗救助体系,强调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的救助模式,不仅给予家庭必要和及时的保障,国家让孩子感受到温暖,也要让愿意救助婴儿的家庭不再感到无力和孤独。 宋华

汇率市场化促进 生产生活“市场化”

从昨天起,国内人民币兑美元买卖价格日最大浮动幅度由之前的1%扩大至2%,每个外汇交易日央行均要公布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所谓日最大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的含意指,每个交易日的实际交易价格以中间价为基准在2%的上下幅度内浮动。扩大汇市交易价格浮动幅度之举,被国内外舆论视为中国稳健推进汇率市场化的最新举措。

在总体肯定的舆论氛围下,有分析人士和机构认为,央行汇市交易价格浮动幅度依然太小。另也有分析人士和机构认为,央行此番推动汇改之力度拿捏恰到好处,既不激进亦不保守,还把握了最为有利的推进时机。笔者认为,不管企业还是个人,只要做外贸生意,从今天起,购汇、换汇及支付结算的市场收益与市场风险从理论上讲已同步扩大。以出口或进口商品或服务为例,外贸企业若拿捏得当,除正常进出口收益外,如果运气好还可利用汇率波动幅度之扩大另发一笔小财。当然,如果把握失当结果正好相反。

此外,若从事海外投资,或拿炒汇套利作为营生,每笔交易之盈亏幅度亦有可能同步放大。就算你是既不从事外贸生意也不从事炒汇套利的普通居民,汇市交易价格浮动幅度之扩大,对你出国旅行,购买海外商品或服务,甚至于你只是偶尔做几回“海淘”,都有可能因实际换汇价格的波动幅度或开心或懊丧。最极端的情形是,你在上午或下午购汇,价格都有可能相差两三个百分点。

既然铁了心以市场作为承载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并将外向型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汇率市场化是必须有的制度配套。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尚未能建立起正常的外汇交易市场,民间的外汇交易是一个以黄牛为介质的外汇黑市。1993年中国汇市重新有条件恢复,至此后的21年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价格前后经历了紧盯美元单一汇率的“政府一口价”时代;参考一篮子货币价格,由央行确定交易中间价并允许在一定幅度内浮动的汇改起步时代。而从今天起,汇市交易价格开始步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虽仍有一定的行政管理但价格浮动区间成倍扩大的价格市场化新阶段。

与此相对应,汇市恢复之初(1994年),交易价格上下浮动幅度是0.3%,经历漫长的14年(2007年)才象征性扩大至0.5%,再经历5年(2012年)扩大至1%。又经历短短两年被即扩大至2%。从中人们已然能够体味汇改虽依然遵循渐进原则,但速度与力度正呈几何级数放大。若从2005年第二轮汇改算起,这么些年间,留给中国汇市参与者几乎已固化的印象是,中国的汇改和中国的汇市交易,始终形同于人民币对美元单边升值之代名词。如果实行真正的汇改,汇市的交易价格一定是有升有降,并在升降中实现交易价格的阶段性动态平衡。

综上所述,汇市交易价格浮动幅度直接决定汇率市场化进程,而汇率市场化旨在促进人们生产生活的“市场化”,这是人们以世俗标尺认知和把脉汇改意义的关键切口之所在。若作体量更大的思考与辨析,汇率市场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置条件和必须环节。人民币若最终能成为与美元比肩的国际货币,它首先得同时具备国际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一般功能,而实现这三大功能,又得先确保人民币与外币兑换价格由供求关系自动形成……

如是,有朝一日,当人民币可在全球任何地方自由使用和流动时,中国人的生产与生活不但不已最终实现了“市场化”,而且还是高质量的“全球化”。 邢理建



《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昆明一城管科长被指常在辖区一家夜市吃霸王餐。据一摊主表示,这名男子经常与朋友在此吃霸王餐,并曾称“我是城管科长,我吃东西谁敢收老子的钱?这条街都归老子管”。有些地方的城管,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名声不是太好,未必就是当地“刁民”太多,民风欠纯,而确实是因为有害群之马混在城管队伍中胡作非为,“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败坏了这支队伍的声音。对此应加以整治,让群众满意。 吴之如 文画

“官不聊生”凸现“四风”之变

难怪我方百姓常有感慨:还是我们这儿的官好当啊!

不过百姓的感受却与一些地方官员迥异。尤其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下达,苍蝇、老虎被不断曝光,所谓“官不聊生”的说法也不胫而走。一家电视台于全国“两会”期间开设了一个对话节目,采访者将一个问题抛给了我国法学泰斗江平先生:您如何看待当下“官不聊生”的说法?

暂且搁置江平先生的回答。我且先以自己现实中的经验回应这一问。我一位政府官员朋友就与我闲聊,这些日子在外吃饭(当然是公费)颇不容易,进出包房都鬼鬼祟祟的,只怕被人撞打乃至声色俱厉,后者只有百般解释、求得谅解的分儿。我的一位留学英伦的朋友也见识过类似场面:电视中,堂堂的一市之长,竟被一位市民代表质问得满脸窘迫,令同学这外乡人大开眼界。在这里,谁是主人,谁是公仆,实至名归,不言自

明。难怪我方百姓常有感慨:还是我们这儿的官好当啊! 不过百姓的感受却与一些地方官员迥异。尤其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下达,苍蝇、老虎被不断曝光,所谓“官不聊生”的说法也不胫而走。一家电视台于全国“两会”期间开设了一个对话节目,采访者将一个问题抛给了我国法学泰斗江平先生:您如何看待当下“官不聊生”的说法?

暂且搁置江平先生的回答。我且先以自己现实中的经验回应这一问。我一位政府官员朋友就与我闲聊,这些日子在外吃饭(当然是公费)颇不容易,进出包房都鬼鬼祟祟的,只怕被人撞打乃至声色俱厉,后者只有百般解释、求得谅解的分儿。我的一位留学英伦的朋友也见识过类似场面:电视中,堂堂的一市之长,竟被一位市民代表质问得满脸窘迫,令同学这外乡人大开眼界。在这里,谁是主人,谁是公仆,实至名归,不言自

明。难怪我方百姓常有感慨:还是我们这儿的官好当啊! 不过百姓的感受却与一些地方官员迥异。尤其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下达,苍蝇、老虎被不断曝光,所谓“官不聊生”的说法也不胫而走。一家电视台于全国“两会”期间开设了一个对话节目,采访者将一个问题抛给了我国法学泰斗江平先生:您如何看待当下“官不聊生”的说法?

暂且搁置江平先生的回答。我且先以自己现实中的经验回应这一问。我一位政府官员朋友就与我闲聊,这些日子在外吃饭(当然是公费)颇不容易,进出包房都鬼鬼祟祟的,只怕被人撞打乃至声色俱厉,后者只有百般解释、求得谅解的分儿。我的一位留学英伦的朋友也见识过类似场面:电视中,堂堂的一市之长,竟被一位市民代表质问得满脸窘迫,令同学这外乡人大开眼界。在这里,谁是主人,谁是公仆,实至名归,不言自

“土豪”打架为哪般?

最近半年,腾讯与阿里巴巴两位互联网“大佬”分别站在“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软件背后,上演了一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补贴大战”。“补贴大战”给传统出租车市场带来了巨大的震荡。时下,随着打车软件的推广,出租车市场供需实现了高效对接,困扰北上广等城市多年的“打车难”一下子缓解了不少。更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乘客宁可站在街头错过几辆空车,也愿意用打车软件约车,因为有补贴、能省钱——“嘀嘀打车”补贴最高时每单达20元,“快的打车”在太原等起步价稍低的城市,甚至出现了打车不仅不花钱反而能赚钱的奇观。有网友戏称:“土豪”打架,快来占便宜啊!”

“土豪”打架为哪般?众所周知,打车软件自诞生以来,就没有一分钱盈利,各路资金轮番投资有广阔的消费拓展空间,眼下可以想见的接入类型就有餐饮、美容美发等规模庞大的生活服务类消费。“土豪”不惜烧钱打擦,其意在抢占移动终端的消费客户。据腾讯披露,一个月耗资4亿元的推广活动,使“嘀嘀打车”的注册用户突破4000万,比活动前增长了一倍。

然而,尽管一开始靠补贴搞市场推广合情合理,但当“补贴大战”进行了一轮又一轮,许多乘客完全是依据补贴多少选择使用哪种软件时,这便宜就有点占得不明白了。因为打车软件技术上不唯一,未来的消费模式也可复制,靠补贴抢来的市场份额不可能稳定、长久。

进而言之,互联网红利不是无源之水,信息手段固然可以提高流通效率、加快供需对接,但社会财富的创造始终源于真实的生产和流通。或许“消费未来”可以暂时刺激投资人的神经,但“落实未来”仍要靠软件本身的优化、后端实体经济的高品质和高效率。单就打车软件的未来消费模式看,如果没有后端实体经济的利润支撑,前端烧钱补贴必不可持续。

较劲打架,不如苦练内功。“嘀嘀打车”软件一度因为用户访问过多而瘫痪,对打车软件安全隐患的质疑也越来越多,而我们身边支持手机终端支付的生活消费场所依然不多见,稳定、合理的界面与便利、多样的消费选择——这些打车软件“消费未来”的必备条件还迟迟没有实现。

“土豪”们,该换地了! 鲍丹

公务员工资调整应重视群体差异

公务员收入要不要调整,随着“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的热议,近来这一话题再次升温。从舆论反馈看,民众对此分歧较大,但从趋势上看,种种迹象表明,接下来公务员调整收入势在必行,在此节点,有必要明确以何种依据调整收入,以及该如何调整等问题。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二月河表示不同意“高薪养廉”,他表示,历史上公务员工资最高的是宋朝,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时过境迁,中国社会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过,这是否足以支撑“高薪养廉”尚存疑。

既然调整公务员收入主要不是为了“高薪养廉”,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公务员收入到底高不高这一问题了。“两会”期间,不少报道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其中既有部委正科公务员晒账本,显示月收入5400元,其中半数只够交房租,收入可谓寒酸;也有孟学农这样的人大代表,他表态自己年薪20万,不赞成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这些回答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公务员生态因人、因地而异,官员腐败现象并非孤例,公务员灰色收入也不再只是江

湖传闻,当然,反映基层公务员收入不高的声音也颇为普遍。去年《中国周刊》一组题为《公务员改变年轻人》的报道,描述基层公务员待遇不高,工作单调、枯燥,一度引发舆论热议,从侧面表明,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的认识趋于理性。

如果注意到公务员收入的结构性差异,就不难理解上述分歧,这个体系中的年轻人,尤其是身处基层的年轻人,的确收入不高,而那些有一定资历和权力的公务员,其收入则相对可观,至于他们的灰色收入,显然也不能忽视。调整公务员收入的前提先要看到这种结构性差异,是一视同仁地普遍调整,还是有针对性地选择性调整,结果迥然不同,如果忽视公务员群体收入的结构性差异,结果可能只会拉大公务员收入的内部差距。

这就涉及调整公务员收入的另一个大问题,即粗放地提高收入可能有损公平。如何在提高收入的同时又避免拉大收入差距,对此一些官员做出的回答颇有价值。国家公务员局局长书记兼副局长杨士秋认为,公务员工资应该上涨,但灰色收入也应通过一系列措施解决;人社部副部长何宪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公务员工

资制度改革,首先就是要解决工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使基本工资占主体,优化工资结构”。从这些回答不难看出调整公务员收入的主要思路,即一方面要减少甚至消除公务员群体的灰色收入,另外调整收入主要应向基层公务员倾斜。

提高公务员收入并不难,难的是解决灰色收入问题,近来随着各地大力阔地开展反腐行动,不少公务员反映各种福利不如以前,但毕竟这只是阶段性的成果,对此今后还须有新的动作,尤其需要一些充满改革气息的制度尝试。

目前中央已责成有关部门调研给公务员涨工资,按照人社部官员的说法,确切地说应该是解决公务员工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措辞的差别看似无关大局,实则关系到具体问题的认知。公务员工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不是简单地涨工资就能解决,社会上不乏收入低的群体,穷者更是不计其数,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过去多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今仍然进展缓慢,虽问题复杂,但恐怕还与决心不够有关。如今调整公务员收入,唯愿不要过于草率,尤其不能给民众以公务员一哭就有好的印象。 南文